

CATALOG OF EAST EUROPEAN STATE ARCHIV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S

总主编 沈志华

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 档案文献编目

第五卷
捷克斯洛伐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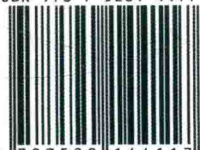
主编 高晓川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201-4411-7



9 787520 144117 >

定价: 9800.00 元 (全11册)

CATALOG OF EAST EUROPEAN STATE ARCHIV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S

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 档案文献编目

总主编

沈志华

第五卷

捷克斯洛伐克篇

主编

高晓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

最终成果

本卷主编

高晓川 哲学博士。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欧洲一体化、中东欧民族关系、经济社会转型及“17+1”合作研究等。出版专著《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编号：12&ZD188）子课题负责人，2015 年度和 2017 年度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项目（编号：KT201501、KT201707）负责人。

目 录

前 言	001
档案编目	044
一 1940~1953 年	044
二 1954~1964 年	285
三 1965~1982 年	365
四 1983~1992 年	705

前 言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捷克斯洛伐克子课题的前言，本篇主要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相关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情况，同时作为历史背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及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历史变迁，重点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演变，以及对外关系的历史状况。

东欧地区聚集了欧洲大多数的小民族，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有别于西欧，比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历史风雨的吹打，长期以来成为欧亚文明冲突、融合与交汇之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一地区主要处在哈布斯堡、普鲁士、俄国及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下，大国地缘政治冲突造成了东欧地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中中部和北部的多瑙河与易北河流域受日耳曼和俄罗斯民族的影响较大，东南欧和巴尔干地区则长期被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控制。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汇集使东欧、东南欧地区成为“文明断层带”。东欧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地缘政治与民族关系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诸多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东欧地区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历史新开端，也是以民族国家为构成主体的民族和文化多元的现代欧洲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东欧国家和民族长期生存在大国夹缝中，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像钟摆一样长期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控制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冷战开始

后,这一地区又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1980年代末,东欧剧变再次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随后东欧国家开启了以回归欧洲为目标的转型并加入了欧盟,具有自主性特点,其结果是多数入盟的东欧国家被纳入以德国为主的欧洲经济圈,德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成为影响东欧国家产经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具有民主传统和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同时又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前沿,因此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它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作为东欧各国社会体制转向苏联化的起点,1948年的“二月事件”令人瞩目;作为东欧国家寻求自主发展的典型表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更是震惊世界。总体说来,从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变化较多受苏联外在因素的影响,具有自上而下发展的特点;70年代后,在国际环境缓和的背景下,其社会演变与转型进程则主要是在内部政治精英与民主知识分子关系矛盾的作用下实现的,呈现自下而上发展的特点。从1945年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体制演变经历了民主政治—集权制—民主政治的轮回。至2019年,东欧剧变已过去了30年,“现实”已经成为“历史”。究竟如何看待和评判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各国这一变化过程的历史意义,人们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离不开对解密档案文献的梳理。

一 捷克斯洛伐克档案馆及相关档案状况

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时期的档案主要收藏于现捷克国家档案馆(NA, Národní archiv ČR)。该馆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内务部档案馆(AMV, Archiv ministerstva vnitra),1950年更名为内务部中央档案馆(ÚAMV, Ústřední archiv ministerstva vnitra),1954年与捷克地方档案馆(AZČ, Archiv země České)合并为国家中央档案馆(SÚA, Státní ústřední archiv),1956年中央农业—林业档案馆(ÚZLA, Ústřední zemědělsko-lesnický archiv)并入,1991年捷共中央档案馆(Archiv ÚV KSČ)和马列

研究所并入。2004 年更名为国家档案馆, 直属内务部。国家档案馆设有 11 个部门, 是目前捷克规模最大的官方档案收藏、整理与研究机构, 藏有自 14 世纪以来捷克地区各历史时期的档案文献, 其所收藏的冷战时期档案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议会、政府机构等各部门的档案。另一个重要的档案机构是军事历史档案馆 (VHA, Vojenský historický archiv), 该馆隶属国防部, 其收藏档案的时间跨度从 1723 年到 1989 年。此外, 还有各地方县级档案馆 (SOKA, Státní okresní archiv), 那里藏有大量专业性或地方性档案。

捷克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 (ÚSD, Ústav pro soudobé dějiny AV ČR) 是捷克主要的档案整理与研究机构。该所是目前捷克学术力量最强的当代史研究机构, 迄今已整理并出版了多部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系统性档案文献集, 如《1948~1953 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与教会》(含 28 件档案)^①、《1965~1969 年经济改革》(含 59 件档案)^②、《1967 年 10 月至 1968 年 5 月捷共的改革尝试》(含 76 件档案)^③等。此外, 近年其他出版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 70 年代后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的文献集, 如《公民论坛——1989 年 11 月至 12 月文献》(含 112 件档案)^④、《从道德革命到民主革命: 1977~1989 年七七宪章文献集》(含 73 件档案)^⑤、《1967~1970 年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化与布拉格之春》(含 142 件档案)^⑥等。

本课题组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主要是围绕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过程开展的, 作为其中的一个子课题, 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时期档案收集

-
- ① Karel Kaplan, *Stát a církev v Československu v letech 1948-1953*, Praha-Brno: ÚSD-Doplněk, 1993. (本课题组编号为 CS00396-CS00423)
- ② Jitka Vondrová, *Ekonomická reforma 1965-1969*, Praha-Brno: ÚSD-Doplněk, 2010. (本课题组编号为 CS00875-CS00933)
- ③ Jitka Vondrová, Jaromír Navrátil, Jan Moravec, *Komunistická strana Československa: Pokus o reformu (říjen 1967- květen 1968)*, Praha-Brno: ÚSD-Doplněk, 1999. (本课题组编号为 CS01595-CS01669、CS0440)
- ④ Jiří Suk, *Občanské forum: Listopad-prosinec 1989. 2. díl Dokumenty*, Praha-Brno: ÚSD-Doplněk, 1998. (本课题组编号为 CS02325-CS02436)
- ⑤ Vilém Prečan (ed.), *Charta 77: Dokumenty 1977-1989*, Praha: ÚSD, 1990. (本课题组编号为 CS00425-CS00497)
- ⑥ Jindřich Pecka, Josef Belda, Jiří Hoppe, *Občanská společnost: Sociální organismy a hnutí Pražského jara 1967-1970*, Praha: ÚSD, 1998. (本课题组编号为 CS02097-CS02238)

和整理项目共收集档案文献集 66 卷, 内含档案文献 5262 件, 收集原始档案 565 件, 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 5766 件(重复者不计), 时间跨度从 1945 年到 1990 年, 主要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转型的三个重要时段: 1948~1953 年, 1967~1970 年, 1989~1990 年。这些档案文献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团体等各方面, 其形式包括党政机关决议和文件、会谈记录、讲话、外交函电等, 大体上反映了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社会变革进程。

其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收集的原始档案主要涉及 6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建设及其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由于技术原因, 一些原始档案复印件字迹比较模糊。

档案语言以捷克语为主(部分为斯洛伐克语), 另有一些英译文和中译文档案, 其中英译文档案主要涉及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苏军入侵以及 60 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与古巴的关系, 档案来自英文的档案集以及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的网站, 中译文档案主要是不同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会议决议, 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部门编译的文件汇编资料。

档案文献提供了观察和诠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演变的基本素材。这些还原历史事件原景的史料有助于更客观和更真实地反映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展的特点, 特别是其中一些史料丰富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共运史细节的认知, 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空间。如关于 50 年代初期政治肃反的档案揭示了肃反运动的机制运作和政策实施特点; 作为体制巩固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执政者把新闻审查作为控制舆情的重要手段, 关于新闻审查的档案说明了审查程序的细致严谨与覆盖面之广; 关于国家宗教政策的档案揭示了执政党上台之初国家政教关系变化的特点。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和 80 年代民主化运动可视为冷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特点。作为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 “布拉格之春”是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突破苏联模式樊篱力度最大的改革实践, 其以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为目标, 对社会主义民主议题和范式的认识与探索丰富和拓展了国际共运的理论与实践, 并对后来捷克斯洛伐克体制演变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80年代民主化运动可视为“布拉格之春”的延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在宣传民主及改革思潮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演变奠定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进程走在了东欧国家的前列,最终出现了“天鹅绒革命”。

二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转型进程及档案介绍

依据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把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发展进程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945~1947年的战后初期人民民主时期,1948~1952年的苏联化时期,1953~1964年的非斯大林化时期,1965~1968年的改革时期,1969~1977年回归固有模式的“正常化”时期^①,以及1978~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及社会剧变时期。

下面即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在对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概要地介绍所收集的相关捷克档案文献。

(一) 战后初期人民民主时期(1945~1947)

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多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这是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和9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东西方集团的对立正式形成,苏联开始逐步把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作为应对冷战新形势的重要对策。对于苏联来说,工业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具有重要地位。1947年7月,出于自身利益和战后东欧地缘政治的考虑,苏联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最后关头退出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谈,这是捷共在苏联压力下第一次改变已定的外交决策,也是捷共开始放弃自身发展路线,走上苏联道路的重要开端。

^① 1968年8月,以苏军为主的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改革夭折。1969年1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下台,以胡萨克为代表的亲苏派力量上台后放弃了1968年4月捷共中央制定的改革路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即《四月行动纲领》),政治经济体制全面回归旧模式,学界称此为“正常化”。

1. 政治外交

1945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①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领导人在莫斯科就战后政府组成和施政纲领等问题进行磋商,双方同意成立民族阵线。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任民族阵线主席。同年4月,在斯洛伐克东部的科希策成立了第一届联合政府,由共产党、天主教民主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代表组成。贝奈斯(Edvard Beneš)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Zdeněk Fierlinger)任总理,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西罗基(Viliam Široký)和另外两名无党派人士任副总理。政府施政路线被称为“科希策纲领”,^②它实行延续战前政体特点的多党联合执政,大力推动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开启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捷共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步提高,特别是在捷克地区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1946年5月,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捷共在捷克地区的得票率约为40%,在斯洛伐克为15%,在全国约为38%,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③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与此不同,在该地区,斯洛伐克民主党获得了62%的选票,表明捷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有限。^④选举后,贝奈斯授权哥特瓦尔德组建联合政府,继续实行多党议会制。

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内外因素的影响。贝奈斯流亡政府曾在西方国家帮助下组织反法西斯活动,对于战后制度的安排,其首先考虑的是在合法延续战前体制的同时,对战前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完善,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蔓延,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另外,曾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被割占的西方大国绥靖政策和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中所起到的作用都使贝奈斯认识到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现实意义。当

①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军侵占后,代表资产阶级政党利益的贝奈斯总统在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流亡政府参加了国内的民族抵抗运动和民族阵线。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在莫斯科成立了捷共国外领导中心,全面领导民族民主革命。

② “科希策纲领”是战后第一届政府的执政纲领。该纲领由捷共在莫斯科起草,并征得其他政党同意后在政府最初所在地、斯洛伐克东部科希策公布而得名。该纲领是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主要的政治纲领,它确定了战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路线。

③ 孔寒冰:《东欧政治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83页。

④ K. Kaplan, *Pražské dohody 1945-1947: Sborník dokumentů*, Praha: ÚSD, 1992, s. 8.

时,苏联承认贝奈斯流亡政府,捷共也支持流亡政府的反法西斯立场。战后,作为国内影响最大的政党,捷共接受贝奈斯为总统,并在民族阵线内与其他政党合作,建立起议会政治。

在政体上,科希策纲领坚持在民族阵线范围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因而人民民主制度具有西方议会制的特点。在经济政策上,这一制度又强调国有化和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有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特征。档案文献证明,在流亡政府时期贝奈斯颁布了多项国有化法令。在对外政策上,该纲领强调与苏联结盟,同时与西方盟国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发展经贸合作,这体现了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有在东西方大国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战略意图。在民族关系上,该纲领强调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纲领是在莫斯科制定的,苏共中央还向捷共提出过修改意见。这说明苏联赞成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建立这一制度。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国关系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与苏联处在大国合作原则下在东欧推行人民民主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①二战后,苏联进一步认识到东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及其在国家安全上的战略地位,因此欲巩固大国地位的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地区的影响和控制,而在这一地区推行人民民主制度符合这种需要,它可以实现保障国家安全和避免破坏与英美同盟关系的双重目标。

2. 经济政策

这一时期政府的主导经济政策是推行国有化,旨在通过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方式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按照科希策纲领,1945年8月,工业部部长向贝奈斯总统提交了《关于矿山、电厂、军工厂和其他重要企业的国有化》草案,^②并由政府各部门讨论修订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矿企业(矿山、电厂、钢铁及铸造企业、军工厂、化工厂、陶瓷玻璃厂、造纸厂、纺织制鞋厂等较大规模企业)国有化的法令和政策。从1945年10月起,政府实施了对重要工业部门及150人以上企业、银行和私人保险公司

① 郭翠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岁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2页。

② Karel Jech, Karel Kaplan, *Dekrety prezidenta republiky 1940-1945*, Brno: Doplněk, 2002, s. 497-509.

的国有化改造。煤炭、电力、冶金和军工等部门全部企业收归国有，化工行业的大部分和其他行业的较大规模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共计有 3119 家企业国有化，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16.4%。至 1947 年底，有 61% 的工人在国有企业就业。^① 出于解决国内民族关系矛盾的考虑，政府采取了驱逐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政策，并把没收其工矿企业作为实施国有化政策的一部分。至 1948 年 3 月，拥有 50 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上实现了国有化。此外，仍有大量中小型私有企业存在，这一时期混合经济的特征明显。在企业管理上，除了医院、学校外，其他类型的企业都实行了自主管理。

在农业领域实行了第一轮土改。1945 年 6 月颁布的第 12 号总统令规定，没收并划分日耳曼人、马扎尔人以及作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其他叛徒和敌人（主要指战争期间投敌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农业财产。^② 1945 年 10 月，以没收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农业财产为主的第一轮土改开始。东欧地区民族混居特征明显，在 19 世纪中的民族运动发展过程中，捷克人已把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居强势地位的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视为“世仇”。战后初期，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仍居住着大量日耳曼人，同时也有部分匈牙利人居住在斯洛伐克地区，没收其农业财产并进行驱逐是捷政府实施的主要民族政策，被没收的农用地分配给捷克、斯洛伐克农民以及其他斯拉夫民族农民。在第一轮土改中，共计没收 300 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全国领土 1/4 的面积，其中包括 165 万公顷农耕地和 130 万公顷林地，绝大部分农耕地分配给约 30 万农业工人、无地或少地的农户。^③

3. 民族关系

确定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间的宪法关系是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在 1918 年之前，自 17 世纪以来长期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两个民族分别在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直接统治下。在一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时期，在民族关系治理上，捷克人同样体现了自己的强势民族特点。政府通过制定政策

① 卡格尔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瞿世雄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 5 页。

② Karel Jech, Karel Kaplan, *Dekrety prezidenta republiky 1940-1945*, s. 276-281.

③ 卡格尔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第 5 页。

和宣传淡化斯洛伐克的民族性，压制斯洛伐克提出的自治要求，并限制斯洛伐克民族机构的权限。捷克人通过对政策或资源的支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获得了相对于斯洛伐克、乌克兰等民族更大的权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相对主导地位。如在 1919~1927 年农业现代化改造过程中，中央政府把 95.1% 的财政投入捷克地区，仅有 4.3% 用于斯洛伐克地区，结果捷克地区 31.7% 的农业企业实现了电气化，斯洛伐克的比例仅有 1.9%。^① 两个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已显端倪。二战期间，斯洛伐克曾独立。

二战后初期，捷共在民族政策上仍延续了第一共和国时期淡化斯洛伐克民族性的政策。如在行政机构设置上，虽有行使地方行政管理职能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但没有与其对应的捷克民族委员会，原则上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行使主导性管理职能。战后政府纲领曾提出建立两个平等民族国家，承认斯洛伐克民族的存在及其民族机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相关机构的权利。但在共和国范围内，国家权力分配和组织结构都不够完善，总统、政府和议会等机构与斯洛伐克民族机构权限不明确，导致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一些政策与中央政策不相符。在实际执行中，中央政府权限被限制在捷克地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该地区行使主要权力。因此，民族阵线中各政党提出确定捷、斯民族新宪法关系的必要性。在 1946 年 5 月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民主党获得了较高支持率，这样捷共对斯地区局势的警惕性开始提高，并改变了之前曾表示赞成斯洛伐克民族机构获得广泛自治权的立场，要压制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政治影响。1946 年 5 月选举产生的宪法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宪法。新宪法草案由捷共议员起草，各政党对草案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国家社会党和人民党坚持以 1920 年宪法为基础进行修订，捷共坚持制定新宪法，而斯共对宪法草案所规定的斯洛伐克民族机构权利部分一直有保留意见。捷、斯两个民族代表专门就宪法民族关系进行了三轮协商，主要讨论和确定中央政府

^① Stanislav Kirschbaun, *A History of Slovakia-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73.

与斯洛伐克地方政府的职能关系。在磋商过程中,双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捷方希望扩大中央政府的权限,斯洛伐克强调地方政府的权限。协商持续到1948年2月捷共上台单独执政为止。

战后初期的人民民主阶段是捷克斯洛伐克延续战前议会政治的短暂时期。这一时期,捷不仅获得了大量西方国家提供的用于进口粮食和其他产品的贷款,而且主要经贸合作伙伴也是西方国家。据统计,1946年和1947年苏联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占捷外贸进口比例分别是22%和19%,占捷出口比例分别是18.5%和19%。^①这一时期,出于担心德国报复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目的,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既有一定程度倾向苏联的一面,同时为促进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也尊重西方盟国立场,希望能在东西方合作上发挥作用。捷对外政策的重要转折点是在苏联干预下退出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档案文献表明,参加马歇尔计划是捷联合政府的决定,并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捷共领导人在1947年7月与苏共领导人会晤后,不顾民族阵线中其他政党的反对,做出取消参会的决定。从后来捷对外关系发展看,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有学者认为,这是人民民主的特殊道路开始结束的信号。^②退出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捷国内政治生态出现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它证明苏联开始对捷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标志着捷共开始放弃在东西方国家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初衷,而走上倚重苏联的道路。

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本课题收集的档案文献情况大体如下。

档案集《1940~1945年总统令》(含253件档案)收录了贝奈斯领导的流亡政府在战争期间发布的各类总统令,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民族政策等各方面,是了解和研究战时流亡政府的宝贵文献。^③

《1945~1947年的布拉格协定》(含29件档案)^④及《1946~1948年宪法

① 科斯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经济发展概要(1945~1977)》,高德平、高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4页。

② 科斯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经济发展概要(1945~1977)》,第51页。

③ Karel Jech, Karel Kaplan (ed.), *Dekrety prezidenta republiky 1940-1945*, Brno: Nakladatelství Doplněk a Ústav pro soudobé dějiny, 2002.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2623-CS02875)

④ K. Kaplan (ed.), *Pražské dohody 1945-1947: Soubor dokumentů*, Praha: ÚSD, 1992.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3705-CS03733)

草案：民族阵线讨论和专家意见文献集》(含41件档案)^①是关于战后确立捷、斯民族宪法关系的档案集。档案文献显示，自建立起独立民族国家后，捷、斯民族关系就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主要国内问题之一，其关系的本质特点仍是不平等，捷克人试图在民族国家中加强对斯洛伐克地区的控制，斯洛伐克人则希望获得更多自治权和平等权利。

《捷克斯洛伐克与马歇尔计划》(含62件档案)收录的档案揭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干预下退出关于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详细情况。^②

档案集《1938~1948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地区的宪法演变》(含12件档案)介绍了1948年前两个地区的宪法制定与修订。^③

档案集《1939~1945年梵蒂冈与斯洛伐克共和国》(含152件档案)介绍了二战期间斯洛伐克与梵蒂冈的关系，其中最早披露了二战期间斯洛伐克主教向梵蒂冈反映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有关情况。^④

档案集《1938~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法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含61件档案)收录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欧洲国家关于日耳曼少数民族法规的档案文献。^⑤

《1946年贝奈斯总统非公开讲话》(含74件档案)^⑥收录了贝奈斯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各类讲话。《两个审判案件》(含66件档案)^⑦则收录了1946~1947年政府讨论对战争期间斯洛伐克保护国及领导人蒂索(Josef Tiso)审判的会议记录。

① Karel Kaplan, *Příprava ústavy ČSR v letech 1946-1948: Diskuse v Národní frontě a názory expert: Soubor dokumentů*, Praha: ÚSD, 1993.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4544-CS04584)

② R.Jičín, K. Kaplan, K. Krátký a J. Šilar, *Československo a Marshallův plan: Sborník dokumentů*, Praha: ÚSD, 1992.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4597-CS04658)

③ Karolína Adamová, Katařina Zavacká, Karel Kaplan (ed.), *K ústavnímu vývoji v českých zemích a na Slovensku v letech 1938-1948*, Praha: ÚSD, 1992.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5811-CS05822)

④ Ivan Kamenec, Vilém Prečan, Stanislav Škorvánek (ed.), *Vatikán a Slovenská republika (1939-1945): Dokumenty*, Bratislava: Slovak Academic Press (SAP), 1992.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4050-CS04201)

⑤ Jiří Pešek, Oldřich Tůma, Manfred Kittel, Horst Möller (ed.), *Německé menšiny v právních normách 1938-1948. Československo ve srovnání s vybranými evropskými zeměmi*, Praha-Brno: ÚSD-Doplňk, 2006.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4202-CS04262)

⑥ Jiří Kocián, Jana Váňová (ed.), *Nezveřejněné projevy prezidenta Beneše. Rok 1946*, Praha: ÚSD, 1995.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4417-CS04443、CS04470-CS04516)

⑦ Karel Kaplan, *Dva retribuční procesy: Komentované dokumenty*, Praha: ÚSD 1992. (本课题组编号为CS04659-CS04724)